

# 美国核威慑研究在历史上的三个发展阶段

● 吴苑思

很显然，“威慑”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早在西方的古希腊时代、中国的战国时代，威慑逻辑就已经在典籍中出现。甚至可以说，自人类社会有冲突时起，威慑逻辑就在有意或无意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但是，一个同样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是，在20世纪中期以前，威慑研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其在学术上的反映就是专门论述这一理论的论文和著作可谓凤毛麟角。<sup>①</sup>但是，核武器及其远程运载工具的诞生和发展很快改变

---

\* 此文根据本人《威慑理论与导弹防御》一书中的相关章节缩写而成，《威慑理论与导弹防御》一书由长征出版社于2001年10月出版。

① 参见：George Quest: *Deterrence before Hiroshima: The Airpower Background of Modern Strategy*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Books, 1986) .

了这一状况。1945年8月6日，就在美国轰炸机在广岛扔下原子弹的同一天，《纽约时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文明和人类现在只有在人类政治思维产生革命的情况下才能生存。”<sup>①</sup>而下令使用核武器的杜鲁门总统也在此后承认，“在国际关系和国内事务中，原子能的释放都构成了一股新的力量，这股力量太具革命性以至于无法在旧的观念框架中思考这一问题。”<sup>②</sup>这样，50年代以后，威慑理论在美国就成为一个相当热门的课题，因为核武器无法防御的巨大毁伤能力非常适合发挥威慑效应，极大地增强了威慑概念的运行逻辑，而人们也试图通过威慑理论来找到维护人类生存的新的观念框架。

下面，我们就以美国为具体分析对象来探讨一下核威慑研究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sup>③</sup>从纵向来看，核时代的威慑理论发展到80年代初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sup>④</sup>其中，第一个十年

---

① Sydnor Walker (ed.): *The First Hundred Days of the Atomic Age, August 6 - November 15, 1945* (New York, The Woodrow Wilson Foundation, 1946), p. 12.

② 同上，第66页。

③ 可能是由于核武器最早诞生在美国，而且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核武库，核时代的威慑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但是，绝不是说其他国家核威慑就没有独到的见解。事实正相反，其他国家也对威慑理论的发展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比如：法国在同盟战略、国家“独立”的威慑力量、欧洲地区威慑等问题上就有不少见地的观点，而中国对核武器的看法在许多年里在世界上也独树一帜。

④ Ken Booth, “The Evolution of Strategic Thinking”, in John Bayliss, Ken Booth, John Garnett and Phil Williams (eds.), *Contemporary Strategy I: Theories and Concepts* (Second Edi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7), pp. 30—70. 罗伯特·杰维斯也将威慑理论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但划分标准不同，三个阶段分别被称为威慑研究的“兴起”、“衰落”和“重新振兴”。参见：Robert Jervis, “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2, Jan. 1979), pp. 289—324.

左右，即 1945 年—50 年代中期，被称为“初级阶段”；差不多第二个十年，即 50 年代中期—60 年代中期，被称为“黄金时期”；而 60 年代中期—80 年代初则被认为是威慑研究的“第三次浪潮”。

## 一、“初级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虽然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震惊了全世界，但威慑理论的发展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威慑研究仍集中在美国政府内部，而民间的威慑研究不仅人数有限，而且在社会中也并没有能够引起应有的反响。这个阶段威慑研究的主要代表在美国有：贾可布·维纳、伯纳德·布罗迪、凡纳瓦·布什以及威廉·波顿等，而在英国则是李德哈特和布莱克特等。<sup>①</sup>他们的作品深刻地剖析了核武器可能带来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对主要国家部署核武器对国际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也进行了讨论。从现在反思威慑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这些论述虽然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其中不少都成为以后威慑研究中的经典之

---

<sup>①</sup> 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Jacob Viner, “The Implication of the Atomic Bomb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90, no.1 (January, 1946); Bernard Brodie: “The Atomic Bomb and American Security”, *Memorandum 18, Yal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1945; see also *The Absolute Weapon: 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6); Vannevar Bush: *Modern Arms and Free Me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9); B. H. Liddell Hart: *The Revolution in Warfa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7); P. M. S. Balckett: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tomic Energy* (London: The Turnstile Press, 1948) .

作。可是，不够幸运的是，这些理论先驱的努力超越了当时大多数人所能理解的现实，当时的国际背景和技术条件决定了传统的战略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初期仍处于主导地位。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使各国忙于应付眼前事务，而无暇深入思考新武器可能带来的政治、军事革命，这为传统思维的延续提供了比较好的客观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与战时盟国——苏联的关系就因共同敌人的消失而急剧恶化。从对东、中欧的争夺到伊朗问题，从欧洲重建到分享原子弹技术，美国和苏联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摩擦。1946年2月，当时任美国驻苏代办的乔治·凯南发出了著名的8000字电报。他认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是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采取敌视态度的根本原因，对付苏联已是美国外交空前的巨大任务，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sup>①</sup>凯南的这份报告在美国高级官员中被广泛传阅，深受高层赞许，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决策者对当时美—苏关系和国际局势的看法。此后不久，丘吉尔就在富尔顿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杜鲁门也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至此，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全面展开，苏联成为美国对外决策中的首要关注对象，但是，无论是在希腊、柏林，还是在朝鲜，杜鲁门政府一旦碰到政治—军事危机，它

---

<sup>①</sup> 乔治·凯南：《回忆录 1925—1950》，第547—559页，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72年。

首先考虑的就是与苏联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sup>①</sup>这种思维定式显然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与以前的历次战争不同，历时六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全球战争和总体战争，占全世界 80% 的人口和大约 70 个国家（地区）先后卷入大战，硝烟弥漫在亚、欧、非、大洋各洲及各大洋上。<sup>②</sup>在这场战争中，所谓前线与后方、军人与平民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生产力水平、科技发展、经济状况乃至人口资源都可以影响战争结果，而战争也对国际格局、各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真正感受到战争是大规模而全方位的。在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人们虽然受到核爆炸的冲击，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作战规模和方式上对人们思考战争的影响仍然要大些，因为这场持续了六年之久的战争比扔在日本的原子弹对大多数人生活的影响要深刻些。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各国忙于应付战争带来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如美国军队的大规模复员和欧洲的重建等，在客观上也制约了当时的研究人员在战略变革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所以，战后一段时期内，在战略研究领域传统思维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是由历史的惯性所决定的。

---

① 参见：Alexander L.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23—24. 在以 X 先生之名发表在 1947 年 7 月《外交事务》的文章里，凯南对原子弹只字未提。

② 颜声毅、李幼芬、俞正梁、朱明权编著：《现代国际关系史》，第 486 页，知识出版社，1983 年版。

除了国际局势的影响以外，对核武器的垄断是美国决策层不能认真讨论核威慑的重要原因。在40年代，有资料表明，美国对苏联掌握核武器的能力估计过低。1949年苏联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认为苏联的第一枚原子弹在1952年以前不会出现。<sup>①</sup>在主要对手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很自然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苏联传统的安全领域进行竞争。在核领域，虽然美国当时的核武库十分有限，<sup>②</sup>但它认为，核武器垄断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苏联及其领导的阵营不敢与美国以及西方阵营发生战争。因此，就像雷蒙·阿隆所指出的，在这个“核纯真”（nuclear innocence）年代，美国决策者将政策选择简单化为“和平或者全面的核战争”，<sup>③</sup>将核武器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简单化显然妨碍了研究人员对威慑研究的兴趣。但是，对核武器的这种简单化认识随着苏联原子弹的爆炸，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受到巨大挑战。在那时，美国不得不重新探讨核武器在国际关系和战争中的运用。

除了核垄断造成的决策简单化，核武器及其武器运载工具的发展不畅也是影响美国决策层对威慑研究重视程度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美国本身的核能力来看，运载工具的滞后降低了军事部门对原子武器的重视。在

---

① 钮先钟：《现代战略思潮》，第151页，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

② 到1949年，美国核炸弹的实际库存才约百枚。参见：George Quest, *Nuclear Diplomacy*, p. 5.

③ Raymond Aro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ic Thought", (translated by J. E. Gabriel), in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ed.): *Problem of Modern Strateg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0), pp. 16.

1945年，美国运载原子弹的惟一工具是航程仅为4000公里的B-29轰炸机，这使得核武器的远程作战能力大大受到限制。要克服这种缺点，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建立海外军事基地，二是发展远程运载系统。到1948年中，B-36远程轰炸机的发展完成提高了核武器的实战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美国军队对核武器及其战略的兴趣。另一方面，从美国面对的威胁来看，在1957年苏联掌握洲际弹道导弹以前，即使苏联掌握了原子弹技术，它对美国的心理影响也相对有限，因为苏联缺乏将核炸弹送上美国本土的能力。但是，洲际弹道导弹与核武器的结合将根本性地改变这种情况，本土直接暴露在对手的核打击之下是迫使美国理论界加强对核威慑研究的直接动力。所以，总的来看，在核时代的最初十年中，威慑理论发展得比较缓慢，这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技术条件有关，也就是说，当时发展威慑理论的客观条件尚未完全成熟。

简而言之，在人类进入核时代最初的十年左右，威慑理论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不少民间研究人员已经指出了核武器将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政治和军事影响，但主要的战略研究仍集中在政府内部。1954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试图利用美国当时尚且拥有的核优势抵消苏联在地区范围内拥有的常规优势。但是，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核威慑战略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论。在这些争论中，大量民间国际问题专家加入了对核问题的讨论，威慑研究空前活跃起来，这预示着威慑研究“黄金时代”的到来。

## 二、“黄金时代”

所谓“黄金时代”就是威慑研究的繁荣期，其最显著的表现形式是大量威慑研究著作的问世。按出版时间先后，代表性作品包括：

- 沃尔塞特：《战略空军基地的选择与使用》（1954）<sup>①</sup>；
- 考夫曼（编）：《军事政策与国家安全》（1956）；
- 基辛格：《核武器与外交政策》（1957）；
- 奥斯特古德：《有限战争：对美国战略的挑战》（1957）；
- 沃尔塞特：“精心计划的恐怖平衡”《外交事务》（1959年1月）；
- 布罗迪：《导弹时代的威慑》（1959）；
- 凯恩：《论热核战争》（1960）；
- 谢林：《冲突的战略》（1960）；
- 基辛格：《选择的必要》（1960）；
- 布尔：《军备竞赛的控制》（1961）；
- 史奈德：《威慑与防御：走向国家安全理论》（1961）；
- 谢林与哈尔普林：《战略与军备控制》（1961）；
- 诺尔与里德：《有限战略战争》（1962）；
- 哈尔普林：《核时代的有限战争》（1963）；
- 考夫曼：《麦克纳马拉的战略》（1964）；
- 摩根索：“核战略的四个两难之境”《美国政治科学回

---

① 该文直到1962年才解密。

顾》(1964年3月);

- 凯恩:《论逐步升级》(1965);
- 谢林:《军备与影响》(1966);
- 诺尔:《论核时代军事权力的使用》(1966)等。

通过以上这些作品为代表的大量研究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到60年代中期,威慑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对象和重要议题已经确立下来,形成了威慑理论研究的一套独特概念和语言,研究领域的界定工作基本完成。与前一个时期相比,这些成果的取得体现出“黄金时代”威慑研究的重要特点,也就是说,大批民间战略问题研究专家参与了威慑的讨论,而且他们关注的焦点比较集中,就是核武器以及核战争的威胁。但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参与研究人员的不同背景,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显然更加多元化,从传统的历史—经验分析法到当时新兴的科学行为主义,各种视角和方法毫不吝啬地被用来争夺威慑研究中的一席之地。此外,这个时期的威慑研究人员虽然大多来自民间学校和研究机构,但他们对美国决策圈产生重要影响,以至于在以后的岁月中美国决策者更倾向于从民间战略学家而不是军事官员中听取有关战略问题的建议。<sup>①</sup>而且,这些民间战略学家中的有些人后来就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主要制定者。

正如上文中已经提到的,威慑研究在50年代中期以后的繁荣与当时的国际背景以及军事技术发展有重要关联。与前十

---

<sup>①</sup> Ken Booth, “The Evolution of Strategic Thinking”, in John Bayliss, Ken Booth, John Garnett and Phil Williams (eds): *Contemporary Strategy I: Theories and Concepts* (Second Edi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7), p.51.

年相似，在威慑研究的“黄金时代”，国际格局仍表现出明显的两极特征，美国保持了对西方阵营的领导权，而苏联也依然被美国及其盟友视为首要的安全威胁。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威慑研究中，两个超级大国，即美国与苏联的核关系成为关注的主要焦点，而美国与其他核国家威慑关系的讨论却很难寻到芳踪<sup>①</sup>，尽管法国和中国在核问题上也都有独立的倾向。将威慑研究局限在两个超级大国关系上是“黄金时代”威慑研究的第一个基本假设。<sup>①</sup>这一时期威慑研究中的第二个基本假设是，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保持敌对状态。对美—苏关系的这种基本评价显著影响了威慑研究的切入点。因此，如何迫使苏联不敢发动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进攻成为这一时期威慑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黄金时代”的国际背景必然有与以前阶段不同的重要因素，否则将很难解释为何威慑研究在这一阶段，而不是前一阶段在美国繁荣起来。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美—苏力量对比，特别是在核力量平衡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是推动美国威慑研究的重要力量。在核时代的第一阶段，美国在核力量的巨大优势显而易见。由于苏联没有核武器或重要数量可以攻击美国本土的核武器，美国实际上保持了一种战略上非脆弱状态，而苏联本土则暴露在美国的核打击之下。5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不仅掌握了核武器，而且具有可以摧毁美国本土的能力。虽然就核武器的具体

---

<sup>①</sup> 参见：Barry Buzan: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Technology & International Reac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87), pp.147—148.

数量和质量而言，美国可能仍占有的一些优势<sup>①</sup>，但是它已经不足以维持美国决策者或研究人员的心理放松状态，因为在美国人看来，这个国家已经从十年前的对苏非脆弱状态转化为目前的脆弱状态，安全环境是在恶化而不是在改善。这种情况下，如何利用正在消退的核优势来防止苏联的进攻自然引起更多美国人的关注和讨论。所以，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威慑研究在美国繁荣的重要原因。

除了国际背景的变化，技术进步也是威慑理论发展变化的重要基础。在 50 年代中期以后，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在两个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尤其需要加以强调。首先，聚变武器的诞生使核武器的爆炸威力比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增加了近千倍。核武器爆炸威力的这种极大提高使得摧毁美国和苏联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变得并非不可想象。其次，核弹头与洲际弹道导弹的结合使进攻武器的飞行时间大为缩短，这样明显地影响了被进攻方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使用液体燃料的导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根本来不及加料，而在有限的预警时间内携带核炸弹的轰炸机能否及时升空也存在很大问题。所以，总的来说，在这一阶段技术的发展使攻防态势进一步向有利于进攻的方向倾斜，美、苏本土及其核力量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

<sup>①</sup> 这种情况事实上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参见：Richard Smoke: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Nuclear Dilemm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p.109 and p.116.

显然，核武库如此脆弱对美国 and 苏联来说都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在敌对关系的引导下，核武库的脆弱会使双方在危急情况下倾向于首先发动核打击，否则，其核武库就面临被对方首先发动的进攻所摧毁的危险。这样，如何降低核武库的脆弱程度就成为维护生存的紧迫课题。就技术而言，增加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可以采取多种途径，比如：加固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地下发射井、提高早期预警系统的预警能力以使战略轰炸机获得更多的升空时间等。通过技术上的这些改进，威慑研究人员发现，有可能将核武库的第一次打击能力转化为第二次打击能力，而这种转化为稳定美、苏核关系提供了可能。在假设美、苏都具有可以彻底摧毁对手的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情况下，双方首先发动进攻的冲动就可能得到抑制。因此，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相互确保摧毁”被美国威慑理论界视为走出生存困境的重要途径。

除了稳定美、苏之间的核关系以外，“相互确保摧毁”实际上还开辟了重新审视美—苏整体关系的新视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联就一直被美国视为首要敌人，但是，如果“相互确保摧毁”被双方所接纳，这就意味着美国与苏联之间事实上还存在着潜在的共同利益，即双方都不愿意看到本国被摧毁。这种共同利益为美、苏在“管理”核能力与核关系方面进行合作奠定了基础。因此，“相互确保摧毁”理论暗示了美、苏合作的可能性，并为（核）军备控制的发展提供了理

论基础。<sup>①</sup> 根据“相互确保摧毁”的逻辑和核武器的巨大破坏能力，核武库的无限增长显然已经变得多余，因此，避免资源在数量竞争上的浪费以及维护美国在核武器质量方面的优势成为美国推动（核）军备控制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根据“相互确保摧毁”理论对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强调，（核）军备控制更加关心调节核武库的组成方式，或者说减少诱发对方首先发动打击的武器系统，如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而保护甚至增加有利于维护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武器系统，如机动基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等。此外，限制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以及防止因错误信息而引发核战争等问题也成为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的重要内容。所以，如何管理核武库和美、苏之间的军事竞争关系，降低核战争的风险，成为“黄金时代”威慑研究的重要延伸。

从今天的立场出发，“相互确保摧毁”有许多需要重新思考的地方，但是，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技术状况而言，这种理论的兴起确实是威慑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但是，这种逻辑在当时也并非完全没有漏洞。在美、苏“相互确保摧毁”的状况下，美国是否有决心履行其对西欧和其他盟国的核保护责任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显然，对于苏联直接对美国本土发动的

---

<sup>①</sup> 有关“脆弱性”与“合作”的关系，请参见：Alexander L. George, “Incentives for U.S. - Soviet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djustment”, in Alexander L. George, Phillip J. Farley and Alexander Dallin (eds): *U.S. - Soviet Security Cooperation: Achievements, Failures, Lesson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641—654. 有关美国与苏联在军备控制方面达成的协议，请参见：Philip J. Farley, “Arms Control and U.S. - Soviet Security Cooperation”, 同上书，第 618—640 页。

核攻击，研究人员对于美国将以核武器做出反应毫不怀疑。但是，在西欧或其他盟国遭到苏联常规武器或核武器进攻的问题上，美国能否用核武器打击苏联本土作为威慑，就存在着重大争议。从总体上看，这场有关“延伸威慑”可信度的争论可以分为两派<sup>①</sup>：其中一派强调“相互确保摧毁”基本逻辑的合理性，认为冲突逐步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的可能性可以阻止苏联向西欧或日本这样的美国盟友发动进攻；与这种看法相对应的另一派认为，“相互确保摧毁”在论证“延伸威慑”的可信度方面确实存在弱点，需要采取其他手段加以弥补。他们认为，应该引入“有限战争”概念来弥补“相互确保摧毁”在逻辑上的缺陷。当然，进行有限战争首先是个可行性问题。对美国及其西欧盟国来说，与苏联进行有限战争可以选择的武器系统有两个，一是常规武器，二就是战术核武器。就常规武器来看，苏联及东欧集团在这方面具有传统优势，但无论美国还是西欧要大规模发展常规力量都将面临巨大的内部政治压力，因此，依赖常规武器与苏联阵营进行有限战争在实践中不具可行性。这样，发展战术核武器，进行有限的核战争事实上被视为修补“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最佳途径。随着战术核武器技术的发展，应该说，有限核战争的思想在威慑理论界有一定的市场，但是，这种理论同样面临着许多不可克服的弱点，其中有两点特别重要，而且很难为美国或其盟国所接受。第一，有限的核战争具有逐步升级为全面核大战的可能性；第二，有限战争在逻辑上进一步将美国与其盟国的安全割裂开来，使盟国对美国

---

<sup>①</sup> 这种硬性划分为两个极端的做法显然是为了分析和理解的方便。在现实中，大多数观点是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而且彼此之间也并不一定要相互排斥。

核保护伞的可信度更加表示怀疑。所以，总的来说，“延伸威慑”是威慑研究“黄金时代”“相互确保摧毁”逻辑中的主要漏洞。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有限战争”理论被提到了争论的前台。与“相互确保摧毁”理论不同，“有限战争”理论事实上强调核武器的实战使用，这意味着核时代实施威慑的方式正由报复对方向“否决”（deny）对方的进攻转变。

### 三、“第三次浪潮”

60年代中期以后，威慑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和发展时期，这在西方理论界被称为威慑研究的“第三次浪潮”。在经历了“黄金时代”的喧嚣之后，威慑研究的第三阶段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冷清，但是，饱餐一顿之后总需要时间进行消化、吸收，更何况当时国际局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实在要求威慑理论界对“黄金时代”形成的大量概念和理论学说进行反思和深化。

对当时的威慑理论界形成最大冲击的首先是越南战争。这场使美国人大失颜面的战争在美国社会引起各种反思，对威慑理论界也一样，它使研究人员发现精心构建起来的理论在实践运用中很成问题。因此，检讨威慑理论构建中方法论上的问题就成为威慑研究第三阶段的一个主要内容。与50年代末至60年代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风气相适应，演绎推理方法在威慑理论前一阶段的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利用博弈论等方法构建起来的分析模式看上去相当精致而优雅，但不幸的是，这些结论

“无法解释”以越南战争为代表的现实问题。<sup>①</sup>这样，历史一经验学派的回归就成为纠正“纯理论”构建中偏激倾向的主要方法。<sup>②</sup>

在批评者们看来，“纯理论家”所构建的威慑理论的第一个缺点就是将威慑过程过于简单化。历史一经验研究者使用大量案例分析说明，威慑现象实际上是个很复杂的过程，产生同一结果的原因往往是多样化的。<sup>③</sup>但是，出于构建理论的需要，“纯理论家”将一些复杂、琐碎或独特的“因素”在概念抽象化、理论一般化的过程中无情地加以省略，而这些因素也许正是同样条件下产生不同结果，或不同条件下产生相同结果的原因。这样，通过要素过滤构建起来的理论在运用时必然显得捉襟见肘，不能满足解释、指导和预测实践的需要。因此，许多威慑研究人员呼吁在构建威慑理论时将国家内部结构、领导人心理素质等多种因素考虑在内。经过70年代对威慑研究方法的这种纠正，在以后的威慑研究中演绎推理与经验研究得到了比较好的结合，而这不管是对威慑理论还是对威慑实践都可以产生积极影响。

---

① 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oom: This is Their Untold Stori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83) .

② Ken Booth, “The Evolution of Strategic Thinking”, in John Bayliss, Ken Booth, John Garnett and Phil Williams (eds.): *Contemporary Strategy I: Theories and Concepts* (Second Edi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7), pp. 54—56.

③ Alexander L.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and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XLI, No. 2, Jan. 1989), pp. 170—182.

除了简单化倾向，威慑研究中对“理性”的过分强调也受到许多批评。由于“非理性”因素无法进行一般化，以计算利益得失为特征的“理性”就成为构建威慑理论的基本前提，在威慑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主流威慑理论强调的理性实际上是西方思维模式下的利益得失观，将这种逻辑分析方式普遍化为全世界都认同的基本准则未免有失偏颇，因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毕竟具有不同的客观条件和历史背景，他们对利益得失的看法就未必相同。因此，在这种“理性”思维方式上建立起来的理论看上去似乎“中立”，但实际上体现了西方的世界观。采用这种观念来观察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当然会觉得有许多不可解释的现象，因此，作为威慑理论基础的理性也需要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思维方式从而加以调整。以罗伯特·杰维斯为代表的学者就对理性问题展开了许多讨论。这些讨论强调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对威慑可信性和有效性的影响，也涉及到非西方文明在观念上的不同特色。<sup>①</sup>此外，真正的非理性，或者说“疯狂”的行为，在国际关系中也并非完全不可想象，因此，非理性甚至也必须作为威慑研究中的一个因素加以考虑。所以，总的来说，以越南战争为导火线，威慑理论界对前几十年的努力进行了反思，从中也为威慑理论下一步的深化提供了方向。

其次，美、苏力量对比在六七十年代进一步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如果说在前十年不管怎么说美国在核力量上仍对苏联保有一定的优势的话，那么到这时，美—苏均势就是对两

---

<sup>①</sup>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仍时有耳闻。World Politics 杂志在 1989 年 1 月出版了关于理性威慑理论讨论的一个专集。

国力量对比更加客观的描述。当然，在一些美国人看来，美国这时相对于苏联在力量上已经处于劣势了。力量对比的这种变化使不少美国人十分不自在，而威慑研究者也在他们的研究中对此做出反应。美国战略优势的日益丧失使他们对于实施以报复为基础的“相互确保摧毁”失去了信心，而这一阶段对苏联核观念的研究也使他们相信，“相互确保摧毁”不能正确规范美—苏核关系，因为苏联从来没有接受“相互确保摧毁”逻辑，虽然美国做了不少努力去推动人们接受它。美国人认为，当时苏联的决策逻辑仍是在战争，甚至是在核战争中生存下来，并争取最后战胜对手。<sup>①</sup>因此，苏联的战略是以实战为基础的“否决”威慑，而不是“相互确保摧毁”为代表的“报复”威慑。这样，美国认为，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来弥补“相互确保摧毁”的不足，由此，美国的威慑也进一步向强调施展的“否决”威慑靠拢。难怪有些威慑研究人员不无痛苦地指出，与早期的愿望相违背，美国不仅没有促使苏联接受相互威慑理论，它本身反倒越来越走向进行实战的威慑学说。<sup>②</sup>

第三，六七十年代美—苏关系的缓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安全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有助于威慑研究的降温。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威慑研究中又出现

---

① 有关苏联对核战争的看法，请参见：R.L.Arnett, “Soviet Attitudes Towards Nuclear War: Do They Really Think They Can Win?” in John Baylis and Gerry Seegal (eds.): *Soviet Strategy* (London: Croom Helm, 1981) .

② Ken Booth, “The Evolution of Strategic Thinking”, in John Bayliss, Ken Booth, John Garnett and Phil Williams (eds.): *Contemporary Strategy I: Theories and Concepts* (Second Edi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7), p.56.

了不少新内容。首先，与“黄金时代”国际格局的特点相适应，当时的威慑研究主要局限于讨论超级大国间的威慑关系。到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美—苏—中三角关系已日益明显，欧洲的力量也正在上升，这自然要求威慑研究也增添新视角。其次，以越南战争为代表的地区冲突和有限战争的爆发，迫使研究人员对“黄金时代”构建的有限战争理论做出进一步反思。与“黄金时代”有限战争理论做出的假设不同，这些地区冲突和有限战争事实上没有发生在美国高度敏感的西欧，美国的介入也并不是因为苏联的直接军事进攻，因此，这些新现象都要求威慑理论做出更合理的解释，提供更有效的手段。要达到这些目的，威慑研究人员就必须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更多的了解。此外，在“黄金时代”，威慑研究讨论的课题比较集中，实际上就是核武器与核战争的问题。但是，新的国际局势使美国认识到，核武器并不是万灵丹，对一些小国、非核武器国家来说，使超级大国寝食难安的核威胁对它们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因此，采用常规威慑或其他手段达到阻止冲突的目的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样，对传统战略学说的重视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最后，在六七十年代，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技术进一步向有利于进攻的方向发展。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两个现象是分导式多弹头技术的运用和导弹精确性的提升。所谓分导式多弹头技术就是指一枚导弹可以携带两个以上的弹头，并且这些弹头独立制导，可以同时攻击不同目标。这种技术的运用实际上意味着，进攻导弹的数量不一定要大于被摧毁导弹的数量，而且进攻导弹对于导弹防御系统的突破能力也随着大为提高。导弹命中精度的提高意味着它可以在距目标更近的范围内爆炸，也

就是说被打击目标承受的爆炸威力可能更大，这就使得加固地下井中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都很难逃脱被摧毁的命运。技术上的这些进展进一步提高了核武器的进展能力，也使得“打击军事目标”（counter-force）战略成为可能。对于美国的威慑研究来说，军事技术的这些发展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相互确保摧毁”理论的疑虑，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如果苏联首先发动对美国军事力量的打击，就可能使美国剩下的核力量仅适用于“报复”苏联的城市、工业基地等目标，这显然使美国的战略选择处于不利的境地。因此，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在这个阶段的发展同样增加了美国威慑理论向“否决”威慑倾斜的趋势。

总的来说，在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里，美国的威慑研究进入了一个反思和深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前一时形成的“相互确保摧毁”和“有限战争”理论受到许多批评，美国人已越来越倾向用进行实战而不是报复的方式实施威慑，而且，针对不同程度的威胁做出不同程度的反应成为威慑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和国际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威慑研究的视角摆脱了超级大国核关系的限制，其他国家的核威慑思想以及其他形式的威慑都成为威慑研究中的新兴内容。

#### 四、影响演变的主要因素

回顾威慑研究在核时代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引起威慑理论演变的两个重要因

素。下面，就将与这两个因素有关的问题做一些总结。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核时代威慑理论发展变化的客观基础。科学技术与战略发展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并不是一个新课题。翻看一下军事发展史就可以发现，武器技术上的进步往往带来战略和战术上的新变化。但是，科学技术进步在军事中的运用也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1933年，德国陆军总司令冯·弗利德里克就曾对古德林说，“你应该认清所有的技术家都是骗子。”<sup>①</sup>而后来，坦克在刚出现时由于其在试验中的不佳表现而差点被德国参谋本部中的保守派打入冷宫。所以，科学技术虽然是军事力量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要认识到一项具体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军事和政治影响有时候也需要一个过程。这种情况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也曾出现，在亚历山大·萨克斯说服罗斯福认真对待原子弹研制的过程中，他甚至将拿破仑拒绝资助富尔顿蒸汽船计划的例子搬了出来。<sup>②</sup>虽然在核武器的研制过程中遇到过一些小波折，但总的来看，核时代的到来将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度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愿这不是因为核武器使整个人类暴露出巨大的脆弱性的缘故。

回顾核时代威慑理论的每一次发展变化，我们都可以发现有一定的科学技术发展为背景。从早期阶段威慑理论不受重视这种现象来说，美国垄断核武器技术，或者说其他国家的科学技术不够发展就是重要原因。而且，在那个阶段，由于核武器刚刚诞生，它对人类社会可能造成的巨大毁伤性后果还未广为

<sup>①</sup> Heinz Guderian, *Panzer Leader* (Dutton, 1952), pp.31—32.

<sup>②</sup> 爱德华·鲁特瓦克：《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人知，这可能也是核威慑在那个阶段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50年代中期以后，飞行速度极高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出现以及它与核弹头的结合是威慑研究迅速繁荣的重要技术条件。否则，在本土可以免于核武器攻击的情况下，威慑研究就不会引起那样广泛的关注。在60年代以后，包括武器小型化、多弹头分导技术的运用以及命中精度提高在内的核武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核武器用于实战的论调提供了技术支持，这在现实中就导致了美国威慑理论进一步由“报复性”威慑向“否决性”威慑转移。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演变在核时代一直是威慑理论变化的重要基础，这样，讨论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技术问题就成为威慑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大量科技工作者由此加入了威慑研究的行列。

除了研究核武器的工作原理和爆炸效应，并由此在技术和工程上使武器系统的建设成为可能之外，科技工作者在威慑研究中承担着教育政府和民众的责任，因为这种武器系统及其产生的效果过于复杂，不是非专业人士仅凭直观印象就可以做出判断的，但对于这些现象的错解释则可能对政府决策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事实上，在许多时候，科学家教育政府的责任是以监督政府的方式体现出来的。2000年5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就指出，知名科学家西奥多·波斯特于5月11日写信给白宫办公室主任约翰·博德斯塔。他指出，美国弹道导弹防御局在评估导弹防御系统整体飞行试验的识别假目标和模拟弹头的能力时，存在不规范的做法，说得严重一点

就是有意造假。<sup>①</sup>波斯特教授的这封信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都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因为他再次对美国现有导弹防御系统在技术上的不成熟性提出了警告，而这是美国许多政府部门不愿意看到的。波斯特教授只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物理学家，但正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对海湾战争录像资料的分析，早在1992年就揭示出，美国军方宣称的“爱国者”导弹拦截成功率中存在不实成份。所以，懂行的科学家参与到威慑和国际关系研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有关政策和理论的科学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威慑理论演变的客观基础，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每次科技进步对政治、军事以及人类思维定式的影响程度并不完全相同，虽然一般而言所有科技进步都是人类的财富，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就拿核武器技术的发展来说，50年代诞生的聚变武器从爆炸威力、制造工艺上来说都比1945年的裂变武器先进了许多，但是，如果从政治意义上来判断，也许反倒是1945年的裂变武器更加重要一些，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中，整个的战略逻辑因为这种武器的诞生而与以前时代表现出显著的不同。<sup>②</sup>从核时代技术发展的状况来看，虽然在爆炸威力、弹头小型化、导弹命中精度，以及武器机动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

① 有关这一事件的分析，请参见：吴苑思、沈丁立：“专家揭示 NMD 致命缺陷”，《文汇报》，2000年6月13日，第3版。

② 有关这个问题更详尽的分析，请参见：Bernard Brodie,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Strategy", in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ed): *Problems of Modern Strateg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0), pp. 159—175.

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技术进展都有利于进攻武器的发展，使战争中的攻防平衡向有利于进攻方的方向发展，而这也正是到目前为止核威慑战略体现出来的总体特征。因此可以推断，在核时代如果还有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进步的出现，有利于防御方面技术的发展应该被视为其中的一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导弹防御技术的发展应该引起威慑理论界的重要关注，并认真探讨它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除了技术条件以外，国际环境的变化也是促使威慑理论作出调整的重要原因。从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几十年的经历来看，国际环境变化对威慑理论演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各国是否面临严重的安全危机；第二，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第三，国际体系的其他状况。

首先，是否面临严重的安全危机与人们对威慑研究的重视程度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从“黄金时代”威慑研究兴起的具体情况来看，苏联掌握核武器技术和洲际弹道导弹技术后，可以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威胁，对推动美国的威慑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样，六七十年代以后，由于美—苏总体关系的缓和，生存压力的下降使研究人员将注意力从维护生存和避免战争的问题上转移开去，威慑研究出现降温的趋势，而相互依存、经济合作等在缓和背景下更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所以，研究人员关心的问题往往紧紧跟随时代主题的变化。不幸的是，威慑研究的兴盛是与安全环境的恶化联系在一起。当人们觉得战争迫在眉睫时，探讨用威慑这种避免战争却维护利益的手段来解决国家间问题的做法就会大大增加。虽然从实际效果来看，威慑最多只是延缓了冲突爆发的时间，它并没有为人们提供最终解决冲突的有效办法，但人们仍

将威慑视为对付危机的一种主要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实施威慑的具体方法可能有所不同，就像在核时代前主要使用常规力量和政治影响力，而不是核武器来实施威慑一样，但是只要冲突继续存在，威慑研究就存在继续深入下去的动力。

其次，与主要对手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将引起一国的威慑战略或理论出现相应的变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在核武器上具有的绝对优势相适应，美国在核威慑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极为简单的思维方式，即或者维持和平或者进行全面战争。这意味着，如果苏联挑战美国的某种重要利益，美国可能与苏联进行一场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的全面战争。但是，美国对苏进行全面报复的这种信心随着美、苏间力量差距的缩小逐渐消失了。1954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在美国就受到许多批评，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在苏联掌握了对美国本土发动毁灭性打击的力量之后，对苏实施核打击威胁的可信度已经大大下降，因为美国人本身也害怕受到苏联核武器的报复。到了60年代，“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在美国的提出和受到推崇再一次反应了美—苏间力量平衡的变化。由于美国这时已不具备惩罚对手的绝对力量优势，威慑研究也就从美国怎样威慑对手向维护“相互威慑”转变，如何“管理”双方的核力量与核关系成为这一阶段威慑研究的重点。所以，一国的力量水平及其与主要对手间的力量对比是威慑理论和学说构建的现实基础，一种威慑理论或学说必然体现出这两个国家间实力对比的一定关系。因此，当一个国家的实力水平及其与主要对手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原来比较适合的威慑学说或理论也就需要进一步修正，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这个国家的对外

行动。

最后，除了以上提到的两种情况外，国际形势的其他发展也可以对威慑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比如说，六七十年代以后，两极格局的松散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拓宽了威慑研究的范围。威慑研究不再局限于美—苏核关系上。地区性事务，例如越南战争的进行，严重影响了对威慑的评价以及威慑研究的范围。在这些力量的推动下，如何处理超级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威慑关系，如何使用非核力量实施威慑都被纳入到威慑讨论中来，威慑研究的关注点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当然，与“黄金时代”关注点集中，但讨论质量极高、出版数量极大的状况相比，“第三次浪潮”中的威慑研究比较松散，而且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将那么多的问题进行深化。但是，总的来说，威慑研究领域的这些变化仍是符合国际局势发展的需要的。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威慑研究中对于中、小国家的重视程度已经有所上升，但到目前为止，威慑研究仍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主要的威慑理论都仍不免以美国的立场为出发点。就这点而言，这些威慑理论并不能被其他国家直接引用，因为虽然威慑理论在基本概念和运作逻辑上有相通之处，但不同国家因其实力水平和在国际力量对比中所处地位不同而对威慑理论和学说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可以预见，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威慑理论仍必须做出相应的调节，虽然这些调节在大多数情况下引起的可能都不是质变。但是，冷战的结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它可能可以为威慑理论出现较大变化提供国际背景。

概括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威慑理论发展变化的两个重要原因。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和

安全环境已经出现重大变化，而科学技术，特别是导弹防御和太空战技术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威慑理论将进一步向何种方向发展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也应该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 作者简介

(以姓氏笔画为序)

- 王义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成帅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朱明权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任 晓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刘永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刘星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庄建中 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孙 哲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  
吴心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吴菀思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沈丁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